

## 戏剧研究网学术研讨会纪要（第二场）

骆婧

-

时间：2009年4月25日上午10:30—11:30

地点：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一楼报告厅

主持人：邹元江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艺术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陆炜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09年4月25日，一个和风送暖、木棉争艳的日子，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里同样涌动着一股暖流。在这里，聚集了一大批戏剧戏曲学界的青年才俊。他们的到来为着同一个目的，那就是“二十世纪戏剧理论与批评”暨戏剧研究网网站成立五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的召开。

上午10:30分许，在短暂而愉快的茶叙之后，学者们再次步入会场，参加第二场学术报告会。经过第一场学术报告的热身过后，现场呈现一派轻松热烈的景象，一场精彩的思想交锋正在逐渐酝酿。本场主持人为两名著名学者——陆炜和邹元江教授。学术报告人包括有：来自《戏剧艺术》编辑部的李伟博士，来自河南大学中文系的元鹏飞教授，来自厦门大学中文系的黄鸣奋教授，以及厦门大学中文系的苏琼副教授。他们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为我们带来了一场丰盛的精神飨宴。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学术前沿的敏锐洞察力，以及缜密的学术思辨性，引发了与会者的诸多思考。

戏曲改革，是升华，还是阉割？

对中国戏曲这一传统艺术的热爱和珍视，是与会学者共同的情结。然而，面对二十世纪以来的时代巨变，中国戏曲经历过一场艰苦卓绝的改革，这是一段每位学者都无法释怀的历史。它的影响力之巨大，直至今日依旧显露无遗。当我们站在新的世纪起点，应当如何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李伟先生就这一问题，做出了他自己的回答。

李伟的报告题目是《欧阳予倩与中国二十世纪戏曲改革》。众所周知，欧阳先生在中国戏曲改革历程中曾有过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他关于戏曲改革的诸多言论，正逐渐被人们淡忘。在李先生看来，目前关于戏曲改革的反思，以及戏曲前途的展望，都应当首先回归到对欧阳予倩戏剧理论的全面评价上。20世纪戏曲改革呈现出三种模式，分别为：

- (1) 梅兰芳式：核心为移步而不换形，是在旧体系内的发展。
- (2) 田汉式：主张建设中国新歌剧，从根本上进行新的文化建设。
- (3) 延安式：核心为京剧改革适应政治需要。

在这三种模式中，李先生认为欧阳予倩走的是“田汉式”的改革模式。他是新文化阵营中的一员，其改革意识明确，甚至比田汉的戏曲改革起步更早。由于他有过丰富的舞台表演实践，因此对戏曲艺术的体会更深，对其中的缺陷也更为了解。欧阳予倩的戏曲改革主要突出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经历了从一名戏迷到戏曲改革家的蜕变。那么当他决意改革时，已经有了自觉清醒的意识，那就是要通过戏曲改革，达到新民、救国的目的。

其次，从名角到名师的过程中，欧阳予倩与以梅兰芳为代表的旧艺人的所谓“新古典派”戏曲改革分道扬镳，而走上了以教育实践为主的改革道路。

再次，欧阳予倩的戏曲改革理论已构成一个初具规模的理论体系，从剧本、表演、导演、舞美和改革性质等方面都有系统论述。

在对欧阳予倩戏曲改革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李伟先生进而提出关于“戏曲现状为何惨淡”的反思。针对这一问题，当前学界有两派截然不同的声音。其中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戏曲艺术要向前发展，首先应当回归古典。这是因为，中国戏曲有着独立的戏曲美学，是不容西方戏剧理论影响和改造的。他们重视的是戏曲的形式美，而忽略戏曲与时代、现实结合的可能性。

另一派声音，则认为适当地借鉴西方戏剧理论，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戏曲要向前发展，就不能闭门造车。他们重视的是戏曲的内容，戏曲与现实结合的文学性。李伟先生正是站在这一立场上，提出欧阳予倩主要借鉴了西方斯坦尼表演体系理论，为戏曲改革做出了贡献。

在民族遗产保护的大背景下，我们应当看到，戏曲今日的发展遭遇瓶颈，并不在于接受传统美学不够，而是反映时代不够。与现实生活不够贴近，自然

会产生时代精神贫血、传统艺术流失的状况。在目前的评奖机制下，必然产生一流舞美、二流表演、三流编剧的尴尬局面。

针对李伟先生以上观点，作为主持人之一的邹元江先生，迅速做出了回应。首先，他认为李先生总结出的戏曲改革“三大模式”并不成立，“三式”实为“一式”，它们是由内在共同性的。

其次，邹先生也不认为以梅兰芳为代表的戏曲改革是局限在旧式表演框架里的“新古典派”，而是典型的斯坦尼式“西化改革派”。

另外，对于李伟先生直接质疑的“中国戏曲不容西方戏剧改造”问题，邹先生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演体系，中国戏曲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其独特性是不容被肢解的。在争论孰对孰错之前，关键要思考的是，在二十世纪戏曲改革中，戏曲究竟向西方戏剧借鉴了什么？是话剧加唱，是介入导演体制，是强调现实性舞美，这些粗暴的做法，无异于将戏曲传统美学活生生地阉割了！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斯坦尼体系被引介到延安后，以张庚为代表的一批人就开始在此基础上讲授戏剧理论，导致后人大多受到斯坦尼表演体系的系统训练。

我们并不是要闭关锁国，问题是就算要借鉴西方，总应当先搞清楚西方戏剧作为一门艺术，究竟意味着什么。从一开始，我们引入西方戏剧理论的目的就不是为了艺术，而是为了政治，是为战斗的、革命的意识形态服务。西方戏剧首先是作为艺术存在的，而我们从未好好地消化过它。如果说当时的做法是时代所限，那么我们今日的反思，就理应抛开政治、意识形态的功利目的，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待戏曲改革问题。

有多少材料，就说多少话！

继李伟之后，年轻的元鹏飞博士也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报告，其题目为《莺莺形象新论》。一上台，元先生就抛出了一句十分朴实却掷地有声的话：“有多少材料，就说多少话。”不可否认的是，许多经典名剧在经历时代演变、意识形态更替的重重外衣包裹下，在内容上与最初的文本产生了诸多差异。尤其是一些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往往在意识形态的重压下产生了变形，造成了普遍性的误解。其中，《西厢记》里的莺莺，就是典型的一例。

长期以来，莺莺形象被定型为反抗封建礼教的勇敢女性。然而，这是否是作者真实的初衷呢？实际上，回归到《西厢记》文本的重新解读，我们不难发

现这只是意识形态影响下，一厢情愿的曲解罢了。同居偷情不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即便是最后与张生终成秦晋之好，也与其自身行动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通过文本的细致解读，莺莺做出与张生秘密同居的举动，其动机不是反抗礼教，而只是为了报恩。当老夫人当面毁婚约时，张生本来心灰意冷准备离开，此时莺莺托红娘向其转告了一句话：“夫人时下有人唧哝，好共歹不着你落空。”正是这句话，暴露了莺莺真实的动机。“好”自然是意指婚约能够实现，但这已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歹”的含义。在这里，“歹”指的是最坏的打算，也就是莺莺自荐枕席，与之偷情，无论如何总得报了张生一纸书信救下全家的大恩情。至于“同居”的行为，其实是不难解释的。在金元之际，社会伦理并不大重视男女大妨，偷情也不受到社会职责。“不着你落空”，表明莺莺的心态是一方面偷情报恩，同时也没打算拒绝与表兄之间的婚约。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文本细节，在于“谁住西厢”。在唐代传奇中原为莺莺住西厢，但到了元杂剧《西厢记》时，已经变成了张生住西厢。这从“煞强如西厢和月等”（第二本第三折）、“望东墙淹泪眼”（第三本第二折），以及天一阁藏抄本《录鬼簿》中《西厢记》总题“郑太后开宴北堂春，张君瑞待月西厢记”等语中可知。只是后人过分拘泥于唐传奇原本，固有“崔莺莺待月西厢”的误会。

由此可见，在解读经典中的古代人物时，不能因为后代的改编而忽略甚至曲解原著的本意。从原有的文本材料出发，避免意识形态的观念先行，才是理论批评所应有的态度。

元博士的精彩论述，得到了主持人陆炜教授的赞赏。避免浮躁的心态，从文本出发解读经典，元博士为我们做了一次出色的示范。张崔两人同居长达一个月，很难从反抗封建礼教的角度来解释。莺莺只是按人性行事，并无自觉的反封建意识，不应当生搬硬套。感谢元博士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莺莺。

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拓展戏剧研究领域，寻求新的研究方法，是本次会议的另一项核心议题。对此，厦门大学中文系的黄鸣奋教授打了头炮，做了题为《新媒体戏剧研究初探》的学术报告。

首先，黄教授就新媒体戏剧研究的由来及其发展历程进行了概述。从广义上说，历史上所有出现过的媒体都属于“新媒体”。从这一观点看，戏剧与新媒体的渊源由来已久。就从近的历史来看，戏剧与新媒体结合的可能性，是在以无线电应用为标志的第四次信息革命中开始显露的。早在1927年，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就预见了一场革命的重要性，并发表《作为通信手段的无线电》一文，成为新媒体戏剧研究之初的经典文献。在继而到来的以数码科技为代表的第五次信息革命中，戏剧在创作、戏具制造、传播、营销、教育、管理等诸多方面实现了数码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媒体研究者开始对戏剧产生认同，一方面在实践中开拓网络戏剧、手机戏剧等新形式，另一方面从戏剧史中积极寻找新媒体的渊源。与此同时，戏剧研究者也开始借助新媒体技术，频繁运用网络、软件工具搜集处理资料，构建网站交流平台，以新媒体戏剧创作与应用为研究课题，实现了新媒体与戏剧学的双向渗透。当然，黄教授同时指出，新媒体戏剧研究尚处创建阶段，形成公认的新媒体戏剧理念，尚需时日。

除了对新媒体戏剧研究历史进行回顾，黄教授更向与会学者介绍了目前研究的三大焦点和热点，分别为虚拟化研究、远程化研究和智能化研究。戏剧虚拟化研究，主要指通过新媒体手段，实现戏剧舞台表演的虚拟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虚拟戏剧”，已经历了虚拟现实（引导观众进入虚拟世界）—增强现实（丰富现实之呈现）—混合现实（使物理空间与幻想空间交叠）的发展历程。在这方面，来自英国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詹那奇（Gabr Giannachi）所著《新媒体戏剧的政治学》一书，对新媒体戏剧所起的政治作用进行了广泛考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过去对戏剧表演背景与现实关系的看法。

另一个研究热点，是新媒体与戏剧远程化研究。所谓“远程化”，力求摆脱剧场作为一个物理空间的局限，搭建观众与戏剧表演之间更为便捷的桥梁。在这方面，西方不仅已有以电子咖啡屋为代表的“远程戏剧”实践，还有超越个人作为有机体空间的“后有机表演”，旨在通过高科技剧院设备实现立体观赏效果的“终结性电影艺术”，甚至在新媒体戏剧中产生了新的剧种“聊天剧”。

新媒体与戏剧智能化研究，也是目前的研究焦点。“智能化”向新媒体戏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不单局限于由人进行戏剧表演，更由人造机器人进

行表演。在机器人戏剧方面，保利那（Mark Pauline）于1978年在美国旧金山成立的生存研究实验室，到2008年底已组织了45场机器人演出，人只作为操纵者和观众出现。日本本田公司于2008年研制的ASIMO机器人可同时处理三人语音要求，突破了多人交流的人体局限，并成功指挥了百老汇音乐剧中的曲目。新媒体戏剧的智能化研究，还体现在智能傀儡戏剧实现的人机交互叙事等方面。

最后，黄教授对未来的新媒体戏剧研究进行了展望，并提出三项主要工作，即：更为丰富的艺术实践，更为清醒的理性审视，以及更为广泛的学术交流。

黄鸣奋教授对新媒体戏剧研究的整体性介绍，使与会学者对于“新媒体戏剧”这一陌生的研究领域有所了解，更对其紧跟时代前沿的学术视野给予了充分肯定。众人纷纷表示，对这一新的戏剧研究领域充满希望与期待。

学术分两种，男性与女性？

如果说黄鸣奋教授首先为戏剧研究方法创新而振臂高呼的话，那么苏琼副教授接下来的性别戏剧研究，则将这一议题推向了高潮。作为厦门大学中文系杰出的青年女学者，苏琼向大会提交了《性别、历史的戏剧表述》一文，并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在报告的一开始，苏琼副教授就敏锐地指出，历史上戏剧从来都是具有性别倾向性的，过去人们认为戏剧、史诗具有男性特征。从这一观点出发，如果进一步考察历史剧与性别创作的关系，则可能发现新的观点。主要的研究对象，集中在李曼瑰、何冀平、张晓风、陈尹莹等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港女剧作家所创作的历史剧。这批女剧作家都有着共同的成长背景和古典文学功底，抛开政治环境、时代更替、地域差异等因素，构成了探讨性别戏剧研究的可能性。

值得集中探讨的第一个关键词是“权力”。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一个由女性主宰的社会，即便是出现过武则天这样的女皇帝，真正的权力依然掌控在为其管理事务的男性手中。女性在推动历史进程中，始终是辅助的作用。反映到极端男性化的文学类型——历史剧，就表现为永远只是配角的女性角色。因此，历史始终是“his-story”，而不是“her-story”。然而，历史剧本身就不可能还原真实的历史真相，这无意间也给了女性剧作家一个机会，使创作主体

的性别在历史缝隙中争取到机会，为女性在历史中的角色由被动性转为主动性，做出不懈的努力。比如，在李曼瑰的剧作《楚汉风云》中，主宰楚汉之争的不仅是刘邦和项羽，更是吕雉与虞姬。前者破坏楚汉和谈，后者促进和谈，两个女性的行动似乎决定了历史的成败。它不仅融战争于情爱交织之中，更彻底颠覆了美人为英雄装饰花边的关系，而构成了美人与英雄之间的平等地位。这与男性作家的同类剧作，如陈白尘的《大风歌》、李健吾的《吕雉》等，都有着较大的差异。尽管这与真实的历史有着较大差异，但也足以显现女性对于政治斗争的独特解读。

除此以外，对于历史上的女英雄角色，如花木兰、秋瑾等，也不乏以其经历为题材的剧作。然而，在题材的处理和取舍上，男女剧作家同样有着截然不同的做法，体现了鲜明的性别意识。另外，女性剧作家还致力于重新构建上层妇女与下层妇女在历史中的地位，前者以宋氏三姐妹为代表，而后者以赛金花等为代表。比如在陈尹莹的剧作《如此长江》中，就将民国史改编成了宋氏三姐妹左右的历史。

苏琼副教授最后指出，从性别角度来考察历史剧，女性作家存在着将宏大历史叙事高度生活化、人情化的创作倾向，擅长从日常生活、家庭关系中表现权力与人性的冲突。在她们的剧作中，儿女情、家务事比比皆是，平常人的情感纠葛环绕着权力斗争。显然，女性剧作家的审美趣味与男性剧作家，是明显不同的。同时，女作家所体现的参与历史，改造历史，使女性成为历史缔造者的勇气，时时刺激着历史叙述的权威性。

从性别研究角度考察历史剧的大胆尝试，获得了与会学者的赞赏与喝彩。主持人邹长江感慨道，苏琼副教授的性别戏剧研究，充分显示了厦门大学戏剧戏曲学学科的一大特色，那就是细腻多情、才情横溢的女性研究视角。同时，厦大还有另一派阳刚气十足的男性视角，即以周宁教授、黄鸣奋教授为代表的一批男性学者，他们勇于追踪学术前沿，研究视野大气宽广，从新媒体戏剧研究到东南亚戏剧研究，都充分显示着这一点。与此同时，以陈世雄、郑尚宪教授为代表，还存在另一种研究方法，那就是扎根地方剧种研究，从田野调查出发，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朴素、扎实而令人敬佩。陆炜教授深为赞同邹教授所总结的厦大戏剧研究三大特色，同时风趣地补充道，今日他有了最大的收获，就是学术也分两种，男性和女性。

主持人睿智、精辟和风趣的总结，引起与会学者的阵阵掌声和欢笑。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下，第二场学术报告会圆满结束。

厦门大学图书馆